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现状述评

邱 婧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鲜有对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现状的整体考察。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状进行观察并分析,全面地把握当前关于彝族文学学术研究的动态。

关键词: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动态;整体考察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8-0020-04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06

Review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Yi Chinese Poetry in the New Era

QIU 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Abstract: Although the Yi Chinese poetry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the overall studies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Yi Chinese poetry is still inadequate among the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 on Yi Chinese epics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entirely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Yi academic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Era; Yi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Development; Overall Study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十分兴盛,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蔚为可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用诗歌来抒发民族自觉开始,到后来诸多彝族的中青年诗人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来创作发表一大批具有优良品质的诗歌作品,都是值得研究的。然而,针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整体考察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对作品和诗人的个体分析,因此,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一、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现状的总体观照

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成果基本分布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和现当代文学专业两个学科之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们多集中于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这些院校的学者们关于彝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较多,探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成果较少。在国内现当代文学专业,彝族诗歌研究基本存在于当代诗歌研究的领域中。

从成果分布来看,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是期刊文章和国内硕博论文。在国内博士学位论文中,对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古典文献、民间文学、口传史诗等议题,并无研究彝族当代诗歌的博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中,7位硕士曾经以彝族诗歌或者包含彝族诗歌在内的少数民族诗歌为议题,但仅张雪超的《论新时期彝族凉山诗人群的汉诗创作》一文是

收稿日期: 2015-06-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流变研究”(项目批准号: 15CZW058)。

作者简介: 邱婧(1987-),女,安徽亳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少数民族汉语诗歌。

专门研究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张雪超将视野投射在异军突起的大小凉山诗人群体,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此之前尚无将凉山地区彝族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创作现象来考察的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仅仅选择了这一诗群的七位诗人展开论述——吉狄马加、吉木狼格、倮伍拉且、马德清、阿库乌雾、阿苏越尔、俄尼·牧莎斯加,其论述方式依然沿袭了传统的以诗歌的民族性和诗性为主的线索,并且他得出结论,新时期彝族凉山诗人群汉语诗歌创作存在缺陷,即情感意蕴的雷同和创作格局的狭小,这个结论之于他的研究时间(2005年硕士论文)来说,并不妥当,因为其论述的七位诗人均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而在2000年之后,凉山地区彝族诗歌创作群体出现了新的代际诗人(如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部分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得彝族诗歌创作呈多元化趋势,很遗憾他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在期刊方面,有关当代彝族诗歌的各类研究论文32篇,大多数论文是就某个作家、某个地区的文学创作展开较为新颖的研究,如议题集中在以诗人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的个案诗歌研究上(其中包括本人于2011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的一篇诗歌批评),总体来说带有局部性与零散性,并非对新时期彝族当代诗歌的整体考察。

总体而言,这两部分研究虽然涉及了对当代彝族诗歌的考察,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一些汉族学者所撰写的彝族诗歌批评,多少带有汉文化叙述的印迹,如对于少数民族裔诗歌的研究基本是沿袭旧有的方法,简单地从所谓“民族性”“审美性”“地域性”出发,将彝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裔的文学或文化现象,拼贴在一起再贴个跨文化研究的标签,严重缺乏同一族裔文学内部的关系性研究,其客观原因在于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了解相当有限。其次,涉及某些“敏感性”的话题,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选择回避,而不去深入分析某些作家、作品中所存在的族裔情感的偏差,而仅只简单地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正面阐释。第三,一些评论者对彝族诗歌的内部批评,往往从诗歌表面入手,简单结合彝民族传统文化,对诗歌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掌握程度有所匮乏,借用批评家耿占春对口传文学的看法来说,就是“常常只知道最基本的几种母题或情感:与武功有关的忠诚、勇敢、荣誉,或者与仇恨有关的贪婪、愚蠢、残

暴等等……很少触及更复杂的历史意识和道德反思”。

二、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中的彝族诗歌研究

当然,在为数不多的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评论之中,还是有一部分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文学史性质的彝族诗歌研究。李力编写的《彝族文学史》和芮增瑞编写的《彝族当代文学》对彝族文学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两本书部分提及了彝族当代汉语诗歌,并对其进行梳理,然而由于这两本书编写较早,仅仅评介了倮伍拉且和吉狄马加等少数彝族诗人的作品。阿牛木支的《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作论》首次将彝语创作和汉语创作都纳入文学史范畴,然而仅部分提及了彝族当代汉语诗歌。很遗憾的是,吴重阳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和中南民族学院编写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提及了许多少数民族裔汉语诗歌,却对彝族当代诗歌只字未提。

相比较前三本书,左玉堂编写的《彝族文学史》对新时期彝族诗歌的介绍较为详尽,包括对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多位彝族当代诗人的介绍,并且对双语创作的诗人进行区分,单独成节,不足之处在于以介绍为主,评述部分较少并且沿袭了1949年以来对少数民族裔文学的“时代性”加“民族性”的批评方法。

比公开出版的“文学史”稍晚的时期,一系列文学史性质的民间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发星先生是一位不在体制内的学者,他自称彝人,多年来立足四川彝族地区,并坚持诗歌创作和批评,致力于彝族诗歌的收集和编写,如《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并撰写了大量以凉山彝族当代诗歌创作为研究对象的诗论,如其2006年出版的《地域诗歌》,收录了《大凉山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地域诗歌诗学随笔》《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等重要文论及部分诗稿。

发星的诗论对于重构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当代汉语诗坛中注入了新鲜的地域写作元素,也对彝族的诗歌创作起到了激励和导向作用。他撰写的《大凉山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和《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既是诗论,又是研究彝族当代诗歌至关重要的材料。

当然,发星对彝族诗歌的研究过多专注于“地域”写作群体,这既是创新、也是局限——过分强调凉山地区的写作,必然割裂云南、贵州彝族地区与凉山地区彝族诗歌创作的互动性。比如,他写道:“彝人在3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凉山保留中华夏商文明遗迹,这首先要归功于金沙江、大渡河两河所冲绝的峡谷与险恶地势,使彝人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1]这种说法实际上否定了云南、贵州彝区与中原长久以来的互动关系,而“地域”写作的过分强调又遮蔽了云南、贵州的彝族诗歌写作与当代汉语诗歌的联系。

继发星之后,彝族学者和诗人们也开始踊跃参与组织彝族诗歌活动、收集当代彝族诗歌。如青年彝族诗人阿索拉毅,致力于彝族诗歌的整理和评介,其《蛮国诗歌俱乐部——当代大小凉山彝族现代诗歌长篇评论》亦是一部针对当代彝族诗歌的重要研究资料,他用诗性和蒙太奇手法书写了彝族诗歌发展史,并且对每一位代表诗人做出评介,然而,阿索拉毅的研究过于富有艺术感却缺乏理论和严谨性,即便如此,他对彝族诗歌的族裔自觉性和敏感性在当代汉语诗坛中,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类是诗歌批评家和诗人们的审美研究。这类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当代诗歌研究和批评领域,关于彝族诗歌的评论文章,有耿占春先生的《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敬文东先生的《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吉狄马加论》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主流当代诗歌批评界对少数族裔诗歌创作的关注。

这二位学者既是诗人又是诗歌批评家,耿占春较早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新时期彝族诗歌创作,同时对彝族诗歌的批评拓展了当代汉语诗歌批评的疆界,是难能可贵的。敬文东近期则以诗性的话语直接介入彝族诗歌,从彝族历史和人类学等议题出发,敏锐地捕获到彝族诗歌和主流汉语诗歌之间的互动关系。巧合的是,这两篇诗歌批评家的评论文章都是关于诗人吉狄马加的,而并没有涉及其他彝族诗人,对于彝族历史的关注多于对当代彝族诗歌的关照。

三、族裔认同与外部关照:多元化彝族诗歌研究

第三类研究是彝族学者对于彝族汉语诗歌的学术研究。此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是阿库乌雾教

授和巴莫曲布嫫教授。彝族学者阿库乌雾(罗庆春)亦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尤其关注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和母语诗歌的创作。阿库乌雾以其彝-汉双语写作实践所带来的深刻体验,对母语与汉语写作之间所存在的既相互促进又彼此质疑的挑战、顺应、再造之关系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阿库乌雾在彝族诗歌研究的同时,又承担了一个民族歌者、本族群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角色,因此在他的彝族诗歌研究中可以看到非彝族学者的精深之处,亦有较非彝族学者强烈的族裔本位性。

在人类学领域,以研究彝族古代史诗为主的社科院学者巴莫曲布嫫女士,也曾对彝族当代诗歌和少数族裔汉语诗歌进行一定的研究。她本身是一位彝族诗人,根据诗人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她曾撰写过《倾听一种声音——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文化语境》^[2]一文,其中对当代少数族裔女性诗歌中的民俗学元素和口头传统做出了分析。在阿库乌雾的诗歌选中,她曾撰写《边界写作: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永远迁徙》一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阿库乌雾诗歌中呈现的民族史诗元素。

彝族学者阿牛木支著有《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作论》一书,这是首次将彝族母语写作纳入到当代彝族文学史的尝试。他的《丰富多彩的彝族当代诗歌》一文,是对新时期彝族诗人的评介,创新之处在于他将研究视角推进到当下最新一代的彝族创作群体,比如麦吉作体、拉马文才等新一代彝族诗人,并察觉到这些新生诗人与新时期第一代彝族诗人(80年代开始创作)的异质性,然而此文过于简略,仅为介绍性质。

彝族学者李骞专注于云南地区的彝族诗人群研究。早在2000年,他就对1980年代以后的云南彝族诗人以及作品进行梳理和研究,从而总结了彝族当代诗歌在云南的发展趋向。除了外部总结之外,他对彝族汉语诗歌还进行一些内部剖析,比如情感结构与诗歌形态等等。他强调诗人自我情感与自然地理符号的关联。

第四类研究是非彝族学者对待新时期彝族诗歌的跨学科研究。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姚新勇先生和马绍玺先生。姚新勇关于少数族裔汉语诗歌的公开发表文章有11篇,代表文章有《杂糅的诗性:新时期少数族裔汉语诗歌语言诗性重构的一种解读》《文化挑战、诗意建构与中国现代

诗——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上)——新时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等,后来大部分收入其专著《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一书。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尝试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全球化与中国全面转型的语境中加以关注,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近30年来各少数民族文学回归本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并对包括汉文化本位回归诉求在内的族裔本位文化回归中所存在的“族裔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持续地跟踪,严肃地思考了族裔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矛盾。

他将后殖民理论纳入少数族裔诗歌研究中,在国内尚属首创,就其对新时期彝族诗歌的研究而言,其创新体现在:他精妙地捕捉到彝族当代诗人为传统文化复归所做出的尝试,并且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边缘民族在诗歌创作中的焦灼和无力感。另外,姚新勇对彝汉诗歌的互动、彝族与现代诗之关系都做出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是研究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材料。然而,由于创作时间较早的原因,其对彝族汉语诗歌的考察仅止于新千年,而对2000年之后出现的彝族诗歌的多元化创作并无提及。

回族学者、诗人马绍玺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云南少数族裔汉语诗歌,代表著作有《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一书,代表文章有《文化撕裂、文化身位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诗歌中的自我和他者——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等。他的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新时期少数族裔的诗歌写作,纳入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去,加以本土与全球、少数族裔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对照性考察。由于地域研究的原因,他的研究文本多为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比如包括普米族、哈尼族、彝族在内的云南诗人,但遗憾的是他单纯针对彝族诗歌的研究并不多,在他的《在他者的视域中》一书里,第四章的文本分析中涉及到的五位诗人中并没有一位彝族诗人。然而,他在《“文化流散”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一文中,提及了彝族诗人选择用汉语写作的困境以及两种语言切换所带来的“文化翻译”问题^[3]。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彝族汉语诗歌写作,是马绍玺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创新之处。

综上所述,这些成果在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和当代汉语诗歌研究领域中所占据的比例

虽然很小,然而却质量很高,如姚新勇先生、阿库乌雾先生的研究,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视野来考察新时期彝族诗人的写作,也为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材料和理论基础。

国外学者针对彝族诗歌的专门研究并不算多。将视野适当拓宽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西方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文学、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也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带有“自我言说性”的关注,同时,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开始兴起。当然,一些研究者往往简单地将后殖民批判理论套用于中国少数族裔汉语诗歌的考察上,或者直接就带有强烈的“解构中国”的心态。尽管如此,就跨文化研究方法使用的娴熟、田野调查的细致、文本解读的深入、资料掌握的丰富、跨学科性的综合视野、多种语言(特别是所研究对象的母语)能力的拥有、尤其是就从整体的中国多民族关系的视角楔入来把握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创作等综合方面看,国外学者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十分值得国内学者学习。我所接触到的关于少数族裔汉语诗歌研究的国外资料有悉尼大学D·Dayton的Big country, subtle voice一文,作者选取三位中国少数族裔的诗人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大国家”之中的“微妙之音”^[4]做出透视和思考,其中他选取的彝族诗人是吉木狼格,不过这位诗人和非非主义等汉语诗坛关系密切,而在国内的相关研究界也极少被当作彝族当代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是十分值得思考的。

参考文献:

- [1] 发星. 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M]. 香港: 银河出版社, 2006: 3.
- [2] 巴莫曲布嫫. 倾听一种声音——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文化语境[C]//两岸女性诗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诗艺文出版社, 1999.
- [3] 奔厦·泽米, 马绍玺. “文化流散”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9).
- [4] D Dayton. Big country, subtle voices: Three ethnic poets from China's southwest[D].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6.

[责任编辑: 刘大混]